



羊城文物

博物馆研究

——广州文博工作四十年文选(一)

广州市文化局 编  
广州市文博学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粤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张健行

封面设计:张力平

羊城文物博物研究

广州市文化局

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华苑印刷公司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32.5印张 2插页 700,000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218—01032—6/K·137

定价 48.00元

## 序

广州，山川毓秀，人杰地灵，是我国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 2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它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我国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素有祖国“南大门”之称。近百年来，广州又是一座革命英雄城市。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及其丰功伟绩，为广州城市历史写下光辉的篇章。广州不愧为镶嵌在我国辽阔疆域上一颗璀璨明珠。

广州的文物博物馆工作始于 20 年代末。那时仅有一间内容单薄、设备简陋的广州博物院。田野考古也是仅仅开端，更谈不上系统研究。到了 40 年代末，工作已陷于停顿，奄奄一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市文物博物馆事业，由于人民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有了较大的发展，迎来了第一个春天。从 50 年代初，广州博物馆正式恢复和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起，到 50 年代末的短短几年间，先后建立了包括历史、工艺、美术、革命纪念建筑等类型的博物馆、纪念馆和文物保管所共 10 个；从事文物博物馆工作人员达 100 多人；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物藏品，为发展文博事业打下了初步基础。十年浩劫，文博事业灾难惨重，损失无法估量，由于忠诚文物事业的同志进行抢救、隐藏和保护，使馆藏珍贵文物得以保存下来。粉碎“四人帮”后，阳光普照，广州文博事业再次迎来灿烂的春天。不但医治了“文革”的创伤，恢复了元气，而且发展的步伐比以前更大更快。原博物馆、纪念馆除已全面恢复开放外，又增加新建具有我市一流水平的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以及一批革命纪念馆、文物保管所等开放单位 11 个，观众年平均逾 250 万人次；文物保护方面，1982 年全面进行文物大普查（包括市属县），基本摸清了我市的文物情况；国务院、省、市先后三批公布了我市三级文物保护单位 83 处（国家级 11 处，省级 31 处，市级 41 处）；投入数千万元重点维修了“文革”时被破坏的文物单位 20 多处；田野考古也有新的突破，中山四路秦汉船台遗址、解放北路象岗南越王墓的发现和发掘，为研究广州秦汉时期的历史和造船史、海上交通史

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标本；科研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出版了一批质量较高、有国内外影响的论著，诸如《广州汉墓》（上、下册）、《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上、下册）、《南越王墓玉器》、《广州西村窑》、《广州市文物志》、《苏六朋·苏仁山书画》（与香港中文大学合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研究文集》、《黄埔军校史料》、《广州起义资料》等。许多专业人员还撰写发表了有一定分量的专业文章；从事文物、博物馆工作的人员也增加到600余人，为“文革”前的4倍，占全省文博工作人员总数近一半。而其中获高级职称的有27人，获中级职称的达56人。所有这些建设成就和人才成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州文物博物馆事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愈来愈重要，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贡献越来越重大。

奉献于读者面前的这部《羊城文物博物研究——广州文博工作四十年文选》，是广州市文博工作者40年辛勤耕耘的劳动成果和智慧结晶。作者中有长期从事文博业务默默耕耘的老专家、学者，也有脚踏实地热爱文博事业的中青年业务骨干，有基层单位的领导，也有一般管理干部。文章分类归纳为田野考古、古建筑、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陶瓷书画鉴赏、文物修复与保护、博物馆学等门类。著述者致力于立论求实，资料求丰，论据求全，见解求精，文字求简，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好学风，言之有物、言而不繁的好文风，调查研究、深入钻研的好作风，这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选》是一本研究广州历史和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好参考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为这本书的问世，写这篇小序并向读者热诚推荐，同时祈望广州市从事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同仁，在党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发扬过去艰苦创业的好传统，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刻苦钻研，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着眼于未来，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广州的文物博物馆工作赶上国内外先进水平，携手迎接第三个春天的到来。

杨奎章  
钟子硕

1992年11月

# 目 录

考古发现与广州古代史 .....	麦英豪 黎 金	( 1 )
岭南战国秦汉剑器刍议 .....	吕烈丹	( 1 8 )
南越王墓的人殉		
——兼论封建社会的人殉问题 .....	吕烈丹	( 2 1 )
象岗南越王墓出土动物食品初探 .....	黄杰玲	( 2 9 )
广州汉墓中出土的玻璃 .....	黄森章	( 3 2 )
广州出土漆器杂考 .....	黎 金	( 4 0 )
广州沙河顶西晋墓 .....	黄森章 冼 乐	( 4 5 )
越华路宋代城基遗址考略 .....	黎 金	( 4 9 )
劳廉墓与何维柏 .....	黄森章 陈伟汉	( 5 4 )
广州“巴斯”墓群研究 .....	黄汉纲	( 5 8 )
广州城始建年代考 .....	麦英豪	( 6 4 )
“楚国南界越过南岭”说商榷 .....	李龙章	( 7 6 )
古代广东地区的珍禽异兽 .....	黄庆昌	( 8 3 )
汉至唐代广州外来植物略考 .....	程存洁	( 8 6 )
古代僧人的海外往来与广州 .....	黎小明	( 9 1 )
千年文宗地 百家翰宝居		
——药洲九曜石寻源探要 .....	陈以沛	( 9 7 )
李凤其人 .....	黄鸿光	( 103 )

清代中暹贸易及其活跃广东经济的作用·····	陈坚红	(107)
岭南建筑保护要旨·····	邓炳权	(116)
虎门之战·····	蔡德铨	(123)
鸦片战争虎门战场遗迹遗物调查记·····	黄流沙 苏 乾	(128)
鸦片战争广州战场遗址遗物调查记·····	黄流沙 苏 乾	(136)
三元里抗英几个问题的我见·····	黎显衡	(142)
试论洪秀全的禁烟思想·····	何桂珍	(149)
洪秀全反孔不是出自革命意识·····	张嘉极	(153)
一八五一年广州地区的士子罢考风潮·····	梁国光	(159)
论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的粤路风潮·····	陈玉环	(165)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修建纪略·····	黄佩贤	(184)
广东光复初期的胡汉民·····	李穗梅	(189)
中国第一个飞行家冯如历史文献纠误·····	黄汉纲	(197)
民主革命的忠诚战士 ——潘达微生平述略·····	司徒彤	(202)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调查纪略·····	陈为民	(207)
国共合作的革命学府 ——为黄埔军校创立60周年纪念而作·····	陈以沛	(212)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	林锦文	(218)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对农民问题理论的贡献·····	陈登贵	(226)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同志奋战 在广东的功绩·····	陈登贵	(235)
团“一大”的召开和张太雷在广东的革命活动·····	林鸿暖	(244)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林锦文	(253)
省港大罢工与广东妇女·····	谢燕章	(260)
国民革命军南讨邓本殷始末·····	梁伯祥	(265)

中共广东区委对推动北伐的贡献·····	林鸿暖 (270)
广州起义策略的探讨·····	黎显衡 (276)
试论广州苏维埃政权·····	梁伯祥 (285)
试论教导团等正规部队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	江铁军 (290)
急流归大海	
——红军第四师的建立·····	江铁军 (295)
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坟园几个问题考实·····	陈勤英 (301)
谈定窑的鉴别·····	赵自强 (306)
元代青花瓷器鉴赏·····	赵自强 (311)
南中国窑器的代表——石湾陶瓷艺术·····	罗雨林 (316)
试论清代民窑青花“过墙龙”盘及年代分期·····	曾土金 (325)
古玉器鉴定要法·····	岑瑞心 (331)
浅论猫眼石与翡翠·····	许丽贞 (336)
试论鼻烟壶·····	梁耀威 (340)
论画家倪瓒继承的美学思想·····	何 为 (344)
新发现之陈恭尹致何绛书·····	李焕真 (353)
苏六朋·苏仁山综论·····	谢文勇 (355)
清代广州的外销画·····	陈 滢 (367)
从中国画发展前途论“岭南画派”的创新实质	
与风格特征·····	郑梅痴 (381)
陈树人的绘画艺术·····	董丹东 (387)
复兴中国画之路	
——广东国画研究会略述·····	李月梅 (396)
易大厂及其信札册·····	张从达 (402)
谱国家之哀愁 写民间之疾苦	
——黄少强的“民间绘画”浅探·····	周宇安 (406)



对广州市文物博物馆事业作用的初探·····	苏桂芬	(412)
博物馆与现代化·····	殷淑芬	(417)
试谈专题展览的功用·····	李 明 李穗梅	(421)
浅谈名楼历史的陈列形式·····	黄务华	(425)
博物馆形象思维教育之我见·····	颜 晖	(429)
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工作浅谈·····	司徒裕	(434)
广州名城保护初探·····	邓炳权	(439)
陈氏书院防水浸的设施		
——把管、渠设备与防止水土流失联系起来·····	李敬镒	(446)
西汉南越王墓青铜器的修复技术·····	冯兆娟	(451)
广州地区铁质文物腐蚀小议·····	陈灿强	(455)
对“广裱”书画的探索·····	梁伟东	(459)
谈谈拓片的体会·····	黄兆强	(461)
附录：广州文博工作四十年纪事·····	苏桂芬 梁华志	(465)
后记·····		(513)

# 考古发现与广州古代史

麦英豪 黎金

现代田野考古在本世纪的 20 年代出现于中国的北方，到 30 年代就进入广州了。<sup>①</sup> 古物的出土比这还要早，其中轰动一时的是 1916 年东山龟岗发现西汉初年木椁墓，椁板上刻有甫五、甫六、甫七等数字，在中国现代考古学上有一个学术名词——几何印纹陶，就是从该墓出土有拍打几何图形印纹的陶器而来的。但当时在广州真正搞田野考古发掘的人很少，发掘的规模和次数也极其有限。<sup>②</sup> 1951 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由此，广州地区有了专责的文物保护和发掘机构。从 1953 年初开始，我们在广州近郊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开展了比较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一开始，在西村石头岗 1 号（秦）墓出土的一件漆器就发现了烙有“番禺”二字的印记，这是广州最早的名字。到了 30 年后的 1983 年，在象岗发现了南越王墓，引起各方的瞩目，该墓出土的铜器有 9 件刻有（或漆书）“番禺”、“蕃”字的铭文。这期间还在先烈路沙河顶一座东汉小砖墓中发现印有“番禺丞”的墓砖，香港九龙李郑屋村的东汉墓也出土印着“番禺大吉”的砖文。<sup>③</sup> 由“番禺”到“番禺”的名字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 4 次出土，无疑这是广州地区古来人文鼎盛的一个反映。这些年在市郊发现的原始社会至春秋战国年间的文化遗址，市区内试掘的秦汉造船工场，已发掘的由秦到明代的古墓逾千座，还有北宋的城墙基址，外销瓷窑址等众多的遗迹、遗物，使我们对这个岭南古都会在古代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

---

**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 秦汉以前，广州属百越之区，有关这一段的历史情况文献无征，又缺少考古资料可以说明。自 1956 年起，我们在广州市东面、北面的远郊和近郊先后发现了多处先秦的文化遗存，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3 处。首先发现的是远郊龙洞附近

---

① 其主要标志是 1931 年“黄花考古学院”在广州成立，该院的《考古学杂志》创刊号，民国 21 年 1 月出版，仅出一期，发表有胡肇椿：《广州市西郊大刀山晋墓发掘报告》。

② 同上。

③ 屈志仁：《李郑屋汉墓》，香港博物馆出版，1970 年。

的飞鹅岭山岗遗址，这里包含有早晚两期的遗址。从调查试掘中得知，遗址包括飞鹅岭及其周围 10 多个大小山岗，属于早段的只有东北面地势较高的青山岗和菱塘岗两地点，表土下的文化层厚约 50 厘米，出土的磨光石器有双肩石斧、石凿、石镑、石环等。陶器以夹砂粗陶、泥质印纹软陶为主，未见有 纹陶出现。这两地点的年代为新石器晚期，其经济生活主要是锄耕农业。其余飞鹅岭等山岗水土流失严重，遗物尽露。在地面采集到大量 纹陶和数量不少的磨光石斧、石镑、石凿、石镞等，但未见有米字纹陶出现。其年代要比青山岗晚，下限在战国以前，约当中原的春秋年间。还有一处新石器晚期的遗存是 1982 年发现的新市葵涌贝丘遗址，地属广州近郊。发现时，遗址已大部分被毁。经试掘，表土下的文化层最厚处 0.52 米。出土有磨制双肩石斧、石镑、网坠等，陶器有釜、盆、罐、钵、鼎、豆等，多属泥质陶，少量夹砂陶拍印几何图形纹，不见 纹。在大量的蚬、蚌、螺、蚌等贝壳中还杂有龟甲、野猪、豪猪等残骨。

**春秋战国年间的遗物** 暹岗古文化遗存位于市东北郊暹岗大岭南面土名苏元山的 3 个小土岗上。1965 年当地农民在岗上挖洞种竹，发现了 5 件青铜器，后经调查，3 个小山岗上遍地都是泥质印纹硬陶片。器形以瓮、罐类为多，纹样丰富多样，有大量 纹陶，未见米字纹陶；石器小而又少，只发现镑、斧、箭镞几件。因水土流失严重，已无文化层。<sup>①</sup> 这里发现的 5 件青铜器，应为墓中的随葬物，墓的情况已不可知。这 5 件铜器除了一对鹿角形饰件外，其他的 3 件：一为直柄小刀（削），通长 17.2 厘米，近脊处一面铸出一长列云雷纹，另一面平素；另一为长 29.4 厘米的宽叶短剑（匕首），柄作扁圆体，分成两节，格微凸起，呈一字形，宽叶的前段急收成锋，后段无脊，铸出几何图形花纹。与这柄短剑类同的，在越南清江的东山、建安的象山和香港大屿山石壁都有发现。暹岗出土的这 3 件青铜利器，其器形与纹饰都可说是中原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应为本地区铸制。3 件铜器的纹饰，在遗址中同出的印纹陶上也有类同的图纹。铜戈的造型较早，相当中原春秋早期器，但遗址出土的印纹陶中有羽状纹和勾连雷纹，这类纹样在战国楚镜中是最常见的。所以，暹岗古文化遗存的年代可推定在春秋晚至战国初年。这是广州市郊出土年代较早属本地区自铸的青铜器。还有广从公路广州路段沿线的一些小山岗上也发现类似的遗存，出土物较少，这里不一一列举。上述这些出土材料，虽然作为广州先秦历史中的某一页，仍嫌材料单薄，内涵尚简。但须知古人留下来的东西是有限的，留下来又得以保存的就更加有限了，所以这一页自有它的份量，从某个角度而言，也可说是广州古代文明史的曙光。

## 二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今两广境内还未见有秦汉以前的城邑，甚至较具规模的民

<sup>①</sup> 《广州市文物志》，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 年。

居聚落也很少发现，表明先秦时期岭南社会经济发展是缓慢的。到了秦汉时期，岭南正式归入秦帝国和汉帝国的版图，此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飞跃阶段。岭南最早的城市——番禺城正是在这期间出现的。广州地区秦汉以后成为岭南的中心，考古发现也以秦汉时期的为多，内容丰富重要，有的发现确具“三史”的功能。<sup>①</sup>

**秦统一岭南战争的遗址与遗物** 秦始皇发动的统一岭南的战争，在广州出土了有关这一重大史事的物证。1962年，在广州区庄螺岗一座木椁墓中出土一把铜戈，保存很完整。铜戈内部凿刻有“十四年属邦工□（师）蕺丞□□□”等字的铭文，字划细如发丝。这戈经长期使用的磨损，加上入土2000余年的侵蚀，有5个字的字划不显，尚幸关键的字还清楚可辨。“十四年”当为秦王政的纪年。因为从戈的形式、铭文体例、字划结构等都与长沙秦墓发现的“四年相邦吕不韦戈”和传世的“五年吕不韦戈”相同。戈铭中的“属邦”不避汉高祖讳，表明它是西汉以前的遗物。战国时期尤其是秦国在器具制作上盛行物勒工名的做法，这戈铭中的蕺字是工师的名字，这个名字还见于“五年相邦吕不韦”戈<sup>②</sup>和“八年相邦吕不韦”戈<sup>③</sup>，两戈中蕺的官职都是“丞”，十四年戈比八年戈隔了6年，已升了官，位居工师了。这把“十四年属邦”戈是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中唯一刻有秦王政纪年的兵器，它在广州发现应是秦平南越时由秦军带来的。秦始皇在那年发兵经略岭南，史无明载，但二十六年统一六国后才平闽越，置闽中郡，所以派五军南平百越的事，最快也要到二十八年才开始的。文献上最早记载平南越史事的首推《淮南子·人间训》：“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罽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sup>④</sup>按照现在的地理位置考查，当时的五军实际上是分东、中、西三线进入岭南的。中线一军，东线和西线各二军。其中西线的两军是从湘桂接境处的越城岭和萌渚岭入广西。中线和东线的进入广东。东线的一军在余干（今江西余干）集结，过福建，跨逾由闽粤必经之地揭阳岭，占领了岭南东部即今粤东一带，由此沿东江可达广州；另一军由南野（今江西南康）过大庾岭梅关，进入广东北部的南雄，然后沿浈水入北江直抵广州；中线的一军由湖南郴县、宜章县之间

① 范文澜：《保护历史文物的意义》一文中指出地下发掘对历史研究至少有三种特殊贡献。第一是创史。第二是补史，第三是证史。载《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4期。

② 《三代吉金文存》20页、28页、2页。

③ 李仲操：《八年吕不韦戈考》，《文物》1979年12期

④ 我们认为，50万军的数字可能夸大了一倍，因为当时没有必要（指对付越人而言），也不可能调动如此庞大的军力远征岭南。假如出征的军队50万，还要加上后勤补给人员，这数字就更为庞大。事实上，秦平南越后五军留戍岭南。《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述赵佗上书秦始皇“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这1.5万人实际上是与留戍士卒在当地结合小家庭。留戍任务除了拱卫秦帝国的南陲外，更重要的是留在岭南地区从事生产开发。赵佗向秦始皇提出“求女无夫家者”的数字仅3万人，也可反证秦平南越的五军当会不在50万之众。证之《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其王、王太后，……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遣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驰义侯遣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实际上，汉平南越时仅用10万人，而《汉书·食货志》则说：“南粤反……南方楼船士二十余万人击粤”，数字明显大了一倍。

的骑田岭推进，过岭后顺武水入北江，顺流而下广州。“十四年属邦”戈无疑是中线“一军处番禺之都”的遗物。至于东线和西线的秦军的遗物也在江西和广西发现。1976年在江西遂川出土一把刻有秦始皇纪年的铜戈，<sup>①</sup>戈的内部刻凿有“廿二年临汾守障库倭工欽造”十二字，同出的还有一把铜矛和上百枚铜箭镞。遂川位于赣、湘、粤交界处，其南面就是“一军守南野之界”的南康，跨过大庾岭就进入广东境了。广西发现的为秦军的墓地。1974年在广西平乐银山岭发现一处古墓群，除一座西晋墓外，其余的为秦到东汉年间。属于秦到南越国时期的墓132座，所出陶器与广州同时期墓的相一致。一般的墓都有实用的如铜戈、铜矛、铜镞等兵器和铁凹口锄、铜或铁的刮刀等生产工具随葬，出土的一把“江鱼”铜戈和一支“孱陵”铜矛，都是典型的秦兵器。<sup>②</sup>这批墓还有个特点是出兵器的墓不见陶纺轮，反之，出陶纺轮的墓都无兵器随葬，表明死者一为军人，一为随军的妇女。平乐地属西瓯，位于湘桂走廊要冲，此地正当“守九嶷之塞”的秦军从湘入桂的路线上。因此，从地理位置、墓葬年代以及出土随葬物中多兵器多工具的特点都足以说明，这个墓群应为留戍西瓯的秦军后来又成为南越国驻边守军的墓地。

战国时主要作战的兵种已分有骑兵、步兵、战车兵，还有称为“楼船之士”的水军是先在南方水网地区的荆楚吴越发展起来。“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sup>③</sup>因地理和自然条件不同而需用不同的兵种。岭南多丘陵山地，道路崎岖，河川隔断。所以，秦始皇在统一岭南的战役中，主要用“楼船之士”。<sup>④</sup>无论输送兵员载运粮草，战船成了当日最急需的军事装备。1974年在广州市区内的中山四路发现一处规模宏大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sup>⑤</sup>从1975年的试掘和钻探得知，遗址深埋在地表下5米处，南距今珠江北岸已有1300米。造船场址有一部分被直接压在南越王赵佗割据称帝时建造的大型宫署遗迹的下面。在400平方米的试掘范围内已揭出一部分船台和木料加工场地。场址选建在当日的海滩上，为一片灰黑色粘土层（经鉴定，含有孔虫，属海相沉积层）。造船场平行排列3个造船台，呈东北—西南走向，已揭开1、2号船台的一部分，结构保存相当完好。从钻探得知船台长在88米以上，南边是一片木料加工场地。另外，在1号船台还出土有铁凿、铁镑、铁挣凿、木垂球和砺石等造船工具。船台是由两行平行的大木板组成滑道（板宽70，厚15厘米），下面用大小两种枕木垫承，俨然如现今的铁路轨道一样。滑板上竖置架承船体的木墩，两两相对，间距不等，构成一个造船台。1号船台中宽1.8米，2号船台居中，宽2.8米，3号船台未揭开。从两行滑板的间距推算，两个船台可分别建造船身宽5—8米，长20—30米，载重量25—30吨的木船。由于船台的滑板、枕木、木墩之间不用钉也没有榫卯固定，所以滑道的中宽和木墩的间距可随需要而调整，还可建造比上述规格还要大的木船。至于船台的绝对年代，除地层关系外，在船台上出土

① 江西省博物馆等：《记江西遂川出土的几件秦代铜兵器》、《考古》1978年1期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2期

③ 《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汉官仪》。

④ 《史记·严安传》：秦“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粮，深入越，越人遁逃”。

⑤ 《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4期。

的年代最晚的是汉文帝四铢半两铜钱，船台枕木经碳 14 测定为  $2190 \pm 90$ （即公元前 240  $\pm$  90 年）。因此，断定这个造船遗址属秦平南越的年间是符合的。这处造船工场遗址所揭示的情况对研究我国古代造船史和科技史等方面，其重要意义实不亚于南越王墓在广州的发现。当然，掘遗址与墓葬大不相同，珠光宝玉都在墓中瘞藏，而遗址，尤其是制造业的工场遗址一般是不可能发现美术精品发现的。

试掘所见有几点特别引人注目：

第一，我国境内至今还未见有秦及两汉的实用木板船发现，所见的仅是器物上刻画的图纹及汉墓出土的木船模或陶船模而已。这处造船工场规模宏大，年代久远，是迄今我国考古发掘中仅见的一个造船遗址。它的发现使我们切实地认识到 2000 多年前中国的造船业已具有巨大的规模和相当先进的生产技术。

第二，船台构造和木材选用都显示出它的先进性和合理性。海滩淤泥湿软，用枕木承垫滑道，可扩大受压面积，保持受压均匀，避免局部下沉，使整个船台取得平稳，符合造船要求。船台各部分结构不作固定处理，间距的宽窄可随需要而调整。这样，既可在每个船台上分别建造大小不同的船只，也可以几个台成批建造统一规格的船只，较大的船还可以拼台建造。这样的构造原理，与今天肇庆西江造船厂和广州近郊的小船厂基本一样，只不过有的用水泥墩代木墩，铺两行钢轨作滑道这样的区别而已。<sup>①</sup> 船台木料经鉴定，木墩用格木，滑板用香樟，大小枕木用覃木和杉木，这完全是根据材质所具有的质坚纹密，抗弯力强，耐磨防虫和质轻富有弹性而不易折断等不同特点而选用的。反映出当日造船工匠对材质的认识已积累丰富的经验。尔后唐宋时期的广船、福船闻名海内外，其实早在秦汉年间已奠下基础。

第三，船台上尤其在木料加工场地上发现许多劈下的木片，还有大量炭屑，有的地方散落成片成层，这是造木船工场特有的现象。今天，在广州近郊的木船厂还可见到：各种船板都要在现场修削，所以随处有散落的小木片遗留；船体外壳的板用火烘烤定型，经火烤过的木板表面，还具有特强的防腐功能。在第 1、2 号船台间淤泥层上发现大量细砂，厚处达 12 厘米，这可能与泉州、汕头一些木船厂“斩包”下水的方法类同。由此可见中国的一些传统手艺沿袭两千年仍无大改。

① 试掘结束后，我们邀请广州几家大船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广州和肇庆的木船厂老工人，还有历史、考古及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的教授等到发掘现场考查和座谈。因为这是首次发现造船遗址，所以对它的性质估计、推断有多种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说：（1）是水坑遗迹说。根据《三国志·吴志》记载珠江每遇秋咸，要引白云山的山泉入城供居民饮用。（2）建筑遗存说。有认为属于干栏建筑的残存。更有认为这是赵佗朝汉台的离宫别苑，因为有一条砖石走道压在船台之上。（3）造船遗址说。虽然在每对木墩上未见有横架的木枋垫承船底，当日如何在墩上造船未明，但遗址中所见的结构及各种迹象与今天造船原理吻合。我们赞同造船遗址说，同时还认为水坑说，不但结构上不可能作引水用，与遗址的年代更不相符。建筑基础说是对船台结构的误解。因为一要稳，二要固，这是建筑基础的基本要求，从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干栏遗存直到今日珠江沿岸的棚居木屋——棚寮，其柱椿无不打入土层中，以求柱子稳固。船台结构不作固定处理与干栏的基础截然相反，而且遗址中所见其他迹象亦与建筑无涉。

第四，秦时分三线五军入越。从《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述来看，其中的中线“一军处番禺之都”最为顺利，一下子就占领了控三江总汇入海要冲的番禺，东线的二军似乎也未遭到多大的抵抗，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是西线。虽然初时凿通了灵渠，深入瓠骆地，还杀了西瓠越的首领译吁宋，但越人凭借崇山峻岭，千沟万壑的地形，利用丛薄的掩护大败秦兵，使秦军损兵折将，“三年不解甲弛弩”。就岭南的交通条件来看，当日秦军的粮草输送，兵员的补充调动，以水路船运最为快捷有效。这处造船工场无疑是“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时修建，为这场统一战争而赶造战船。船台中的滑板和大枕木仍保持棱角整齐，表明船场的使用时间不会很长，大概当战争结束之后就再没有在此造船了。秦汉时期凡属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都是官营的，还大量使用刑徒和士卒进行生产，这个船场更不例外，因为，船台及木料加工场地上都发现较多的三棱铜镞等情况亦可说明。

《淮南子》成书比《史记》约早30年，从《人间训》中记述的秦军入越情况看，与《史记主父偃传》所载相比较，在主要事实上是完全相同的，对某些情节的记述尤为具体。诚然，《淮南子》不属史书，但秦始皇发动的统一岭南的战争，距这两书完稿的时间仅相隔“汉兴七十年”，在当时来说，还属于近现代史的大事，所记当不会有误。而今有上述遂川、平乐、广州三地发现的史迹、遗物，尤可得到印证。

**南越王墓的重大发现** 秦的国祚很短，广州入秦的时间尤短。秦亡，赵佗据岭南三郡建南越国。传5世93年。据《史记》和《汉书》的南越传所载，一世赵佗，在位67年，至汉武帝建元四年卒。二世为佗孙赵胡，在位16年。南越二世的陵墓于1983年6月在广州越秀公园西面的象岗发现了，因墓中出有龙钮“文帝行玺”金印得以确认。这座墓深埋在象岗腹心深处，仿效汉文帝霸陵的凿山为陵，不起坟的做法。象岗是一座海拔49.71米的风化石英沙岩山岗，墓坑从岗顶最高峰处开凿，平面如“凹”字形，深20米。前端从两侧打横掏洞构筑耳室，再前为狭长的斜坡墓道。墓坑中用750多块红砂岩大石构筑成一座东西宽12.5米，南北长10.85米，平面100平方米的地下玄宫。仿照前朝后寝布局，分为前后两部分，设两道石板门隔开。前部3室，前室居中，东西两个耳室在掏洞中建造；后部4室，停放墓主的棺椁的主室居中，左右后三边有东、西侧室和后藏室。各室都有过道相通，墓底铺地板，顶部共用24块大石板铺盖，前室的顶盖石最大，整石5平方米，重逾两吨。全墓发现15个殉人，分见于墓门外、前室、东耳室及后部的两个侧室内。墓门前用大木构筑外藏椁，椁内左侧埋一殉人，其身分约当门亭长，三边放17个大陶瓮和铜车马器、仪仗饰。前端的斜坡墓道上有一殉人，有陶器、铜器随葬。从出土的随葬器物来看，墓内前后7室各具各自的功能。前室顶部及周壁都施朱墨两色的卷云纹，装饰华丽，象征主人的朝堂。室中西边置漆木车模型，东边有一殉人及漆木棺的灰痕，殉人有组玉佩和铜镜随葬，还出一颗鱼钮“景巷令印”的铜印，由此得知殉人为宦官兼御者。东耳室是宴乐藏所，室内沿北墙根下排列青铜钮钟14件一套，甬钟5件一套，还有铜勾鑿8件一套。每个勾鑿正面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两行八字，并由大而小分别刻有“第一”至“第八”的编码。青铜钮钟前顺次排列两套石编磬，一套8件，另一套10件。室中还有提筒、甗、壶、钫等大型鎏金铜酒器，漆木胎贴金花饰片的六博盘和12个用青玉和水晶做的六博棋子。还有琴瑟等乐器。在石磬之前，发现几块殉人的

颅骨残片，因墓中多次积水，器物浮移，殉者的其他骨殖也散乱了。据颅骨鉴定为一青年，可能是个乐伎。

西耳室随葬物品种类繁多，是个各种珍宝、用器的库藏。包括青铜礼、乐器，陶、铜生活用具，车马器，皮铁甲冑，玉饰金银饰物，原支象牙，五色药石，漆木、竹器，以及丝织品等，大小总计约4000件。多数器物有竹筒或麻包或草袋或漆木箱盛放，加上麻绳、藤条等捆扎、缄封。但损坏严重，外盛器具仅见残迹。例如一个漆木箱盛着4000多粒小墨丸与2套石砚在一起；弓弩发射用小铅弹、陶网坠各有五六百颗，分放两个竹筒中；两个漆箱分别盛有鎚、鏃、削、斧、锯、铲、锉、凿、劈刀、刻刀、削刀和镰刀等上百件的铁工具；一个漆盒内盛有43件玉具剑饰，其中不少有圆雕高浮雕龙虎纹，在出土的汉代玉剑饰中实为罕见的精品。还有圆雕玉舞人、玉璧、玻璃璧、平板玻璃片饰、错金铭文铜节、绘画铜镜（二面，其中一面直径41.4厘米，在已知的汉代圆形铜镜中，可能以此为最大。镜中有一组的画面较清晰，有4人正在观赏两个武士的斗剑表演）。还有一面嵌金银绿松石的带托铜镜，镜面含铜60.42%，锡31.20%，铅7.19%，光洁度高，质坚脆。而镜托含铜锡较低，分别为40.43%、0.72%和56.55%，质较柔软，不易断裂。两者用胶漆粘合，用刚柔相合的办法组成一个器用，在当时来说是很先进的，在考古发掘中也属首次发现。

墓主一棺一椁，置后部正中的主室内，已朽，棺椁的左边，竖置一架漆木大屏风，右边放成捆成扎的铜、铁兵器。墓主身穿丝缕玉衣。玉衣的上下及里面共放有39块玉璧：在玉衣面上的胸腹部有一套组玉璧，由6块大璧4块小璧用丝带编联而成。玉衣下还垫有5块大璧，即铺在棺具的底板上。玉衣里面贴身铺盖14块玉璧，其中两块夹于两耳处，3块较大的纵列胸腹间，一块透雕三龙小璧压在阴部的位置，其余的8块分列两侧，玉衣面罩上盖着2块透雕龙纹玉璧，其上还覆盖一块幪目，这是在一块丝绢上缀有8片槌髻成对称羊头纹图案的杏形薄片作装饰的面幕。头顶及双肩上方各放有一块精美的透雕玉饰，双脚下有一块双连玉璧。玉衣的胸腹位置处发现有珠襦的残留，其上还有一串组玉佩饰，经复原，长60厘米，由玉璧、玉璜、玉人以及金、玉、琉璃等小珠配串起来。在这串组玉佩饰之上放有9枚印玺，3枚为一组，各用一个漆盒盛着，漆盒已朽。玉衣两侧的腰间置铁剑，每侧5把，共10把，其中玉具剑5把，有一把长1.46米，为目前发掘出土最长的汉剑。在两侧的铁剑旁分置四对铜牌饰，左右各一块成对，其中3对为嵌蓝色平板玻璃牌饰，一对为鎏金的龟龙纹牌饰。内棺的两侧分置玉璧和玉璜，左边的3块玉璧和右边的3块玉璜同位于棺侧的前、中、后处，一璧一璜相对。外椁的四角上各放置一块大玉璧。外椁比内椁要长，两端都有一段空位，形成“头箱”和“足箱”。足箱内有139块仿玉的陶璧和2块青白玉璧擦成4堆，当中放一个银盒，盒内还有半盒药丸残留。头箱内放的都是精美的玉器：一个满藏珍珠的漆盒上，叠放7块大玉璧，放在上面的一块直径34厘米，为发掘出土玉璧中最大的一块。还有青白玉角杯，嵌玉盖杯，玉盒，七节玉带钩，龙虎合体玉带钩，龙纹玉钩和卜甲等物。另外，棺椁的前头平置一件承盘高足玉杯。由玉、金、银、铜、木五种不同质材组合成，造型奇特，制作精巧。秦汉时期统治阶级中有服食求神仙的习尚。由此，联系到足箱中出土的银盒，盒内放存有药丸，



西耳室陶甗中也出有药饼，还有中草药和成堆的五色药石与捣炼药散的铜杵臼共存，据此，推测这个承盘高足杯可能是墓主生前服食五色药石以求长生的特殊用器<sup>①</sup>。

根据已发表的材料统计，在我国的两汉墓中出土玉衣包括仅存玉衣片的计有 34 座墓，其中完整的西汉玉衣有 4 套，东汉玉衣有 7 套，分有金缕、银缕和鍍金铜缕，南越王墓的“丝缕玉衣”是第一次发现。在已发现完整的玉衣中，又以这套玉衣的年代为最早。据考证，第二代南越王死于元狩元年，即前 122 年，所以它比满城汉墓刘胜的金缕玉衣要早出 10 年。经过修整复原，全套玉衣由 2291 片玉片编缀而成，长 1.73 米。其中头套面罩、两手、两鞋共五个部分的玉片琢磨光洁，都是四角钻孔，用丝线编联，内衬绢帛，而上身及两袖筒和两裤筒的玉片都是四边用朱色丝带粘贴，再对角贴成菱形的网格纹样。底用布衬里，这些玉片大多用废旧玉片或边角料切成，厚薄不一。全套玉衣无论造型和玉片加工都显示出早期的草创样式。玉衣是整取的，在室内修整复原中发现，玉衣内的墓主遗骸多数已成粉末，但整个骨架形态还可以辨认，从仅存的残顶骨、颅骨、下颌残骨及几枚牙齿鉴定，墓主为男性，年龄在 30 至 45 岁之间。汉人迷信玉石能使尸体保持不腐，第二代南越王除以玉衣作葬服外，还用许多璧、各种佩玉，还有珠襦，形成多层位的配置于玉衣里外，上下周围。用葬玉数量之多，在汉代高级贵族墓中，就目前所见以此为最。

东侧室是姬妾的藏所，这里埋葬四位夫人，她们都有漆木棺材，各有印玺、铜镜、组玉佩等随葬。出“右夫人玺”龟钮金印的还有“赵蓝”象牙印和无字的穿带玉印、绿松石印 3 枚同出。其他三位为“泰（大）夫人”、“左夫人”、“□夫人”，都是鍍金龟钮铜印。本室所出组玉佩可以复原的有 7 套，以右夫人棺位置中出的 2 套最为精彩。古人尚右，以右为尊，右夫人应是诸妃之首。

西侧室发现 7 个殉人，都无棺木，其中 5 个殉人位于室中南部，斜躺在地板上，排列成行，骨殖已成粉状。另 2 个殉人只存部分牙齿和残骨，与成堆的猪、牛、羊祭性的兽骨混在一起，这种情形，或许与墓中多次积水浮移有关。各殉人都有少量随葬物，其中最珍罕的是一面六山铜镜和一个铜框镶玉卮。室中发现“泰官”和“厨丞之印”封泥多枚，殉者身份可能是墓主的庖厨隶役。

在主棺室之后有 2 条贴墙石柱，把室的北端分隔出一个不到 4 平方米的小间，为后藏室。这里堆置着大小铜铁炊器，陶、铜容器，其中铜器 53 件，有越式的鼎、釜和烤炉、煎炉，还有提筒和鉴等大型铜容器。陶器 56 件，以瓮、罐为多，还有铁器、银器和滑石器，又发现“泰官”封泥多枚。在炊器和容器内尚存许多海产及家禽家畜的残骨。有趣的是发现有不少于 200 个个体的禾花雀，还有河虾。后藏室无异是一个墓主的御厨库藏。

墓主身上出 9 枚印章，一为龙钮“文帝行玺”金印，一为龟钮“泰子”金印，一为复斗钮“泰子”玉印，一为复斗钮“赵昧”玉印，一为螭虎钮“帝印”玉印，其余的有

① 此器由三条金头银身的龙共衔一个三瓣玉杯托，以举玉杯，有升天的寓意，或许与汉武帝时的“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的承露盘功用相当。铜盘的平沿去锈后，未发现铭文，故未可遽定。